

中国金融研究新范式： 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理论有机结合

■陈经纬

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而针对“中国特色”经济现象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逐步纳入国际学术界,这需要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尽量能够运用国际学术界常用的研究范式分析和论证各种经济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以及优缺点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本文试图把这些作者的想法和看法进一步引申和细化到金融学领域,提出并论证主流经济学方法与演化经济理论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能够对中国金融问题进行解释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的结论主要针对中国金融现实情况提出了理论界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有关课题之建议。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演化经济理论;中国金融问题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02-0028-10

陈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28)

一、引言

转型时期的中国和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经济理论界为了把“中国特色”经济现象研究成果逐步纳入国际学术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逐步运用国际学术界常用的研究范式分析和论述各种经济和金融问题。但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在西方经济金融理论成果(特别是主流的)以及在成熟和常规市场中的经济金融“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甚至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金融行为和现象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钱颖一)。这一现实问题,为国内理论界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运用西方经济金融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金融问题?

究竟主流经济学有哪些优点和长处且对我

们是可用的呢?黄有光^[1]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强调经济行为研究并针对该内容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二是有很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有很多极富洞察力的结论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参照;三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分析方法可以引用来分析非正统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有些国内著名学者^{[2][3]}对之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进一步来说,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毕竟是经过众多学者们努力和发展的结果,且被当今世界经济学术界比较认可的理论,特别是它的思维模式、分析方法、基本原理和一些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是很有用的。因此,本文首先对主流经济学及其延伸到金融领域的分析方法之要义、优点和局限进行归纳,之后对演化经济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并提出及论证了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理

论的相互有机结合机制,对于研究中国金融时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最后是对全文内容进行整体性的归纳和总结。

二、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与方法在金融理论的延伸

(一)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理论延伸

归纳主流经济学一般研究模式,大致上有以下五个基本步骤和逻辑:第一步,经济现象观察,即作者往往会根据经济现象观察(经验或感悟)提出自己的某种主张或假设;第二步,根据假设条件和经济行为的基本假定在寻找均衡的基础上进行建模;第三步,主要是对理论模型进行逻辑演绎和差异化条件下各种分析;第四步,根据以上三个步骤所推理出结论,对未来经济现象进行相应的预测或者对相关政策建议进行深入分析;第五步,将推演的理论带入实际中进行观察和检验,也就是把经济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收集现实数据并对数据处理,最后运用计量技术对经济理论进行验证。本文在借鉴田国强有关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的“五步说”^①基础上,将其延伸并运用到金融理论分析框架。

1.金融环境界定。主要是针对所研究的金融问题或者金融活动参与者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约束条件,从实际出发对金融环境做出相应的界定,主要包括:国情、经济环境、金融制度、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等内容。由于金融业为政府规制行业,故金融环境通常由金融活动参与者、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特征、金融制度和法规环境以及制定金融规制的“习惯”等组成,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金融生态环境的客观一般性描述;二是精炼刻画和归纳金融环境特征,且为了避开细节末梢,而把注意力引向比较关键、核心的问题,需要对所要研究金融问题的金融环境进行特征化的刻画。比如,针对中国转型金融现象和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在发达国家和比较规范市场条件和环境下所

得出的理论结果,需要归纳出相应的金融约束条件或者总结出不太规范制度环境下的金融环境特征,包括:初始条件、金融产权、政府行为惯例、金融制度的历史演变等因素特征。从理论逻辑上讲,对于同一金融问题或者金融现象,之所以会有许多的差异性金融理论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研究者对金融环境界定的差异而造成的^②。

2.行为人假设。金融理论的行为人假设主要是指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假设,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既是经济学的根基也是金融学的基础。实际上,一个金融理论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者实用价值,一项金融制度安排或金融政策是否能够到达既定的目标和服务经济与社会效果,关键看该金融理论的行为人假定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大多数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比如,在金融交易、金融制度或规则设计方面,把人类的利己行为作为金融活动参与者基本假设或前提是极为必要的^③。

3.给出金融制度安排。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使得近百年来的金融规则以人为设计的正式规则为主,并以法律法规等正式金融规则形式表现,对金融业的规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其他行业所不及的,正式金融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也就成为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因此,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往往受制于不同金融环境和金融规则等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金融活动参与者所采用的对策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也就是,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游戏规则)将导致金融活动参与者不同的激励反应和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不同的法律内容安排会对金融主体行为起不同的影响。^④

4.行为人选择或者均衡结果分析。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就是深度分析金融活动参与者所做出的权衡取舍,即在一定的金融环境下以及正式金融制度安排(游戏规则)之后,金融活动参与者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出激励反应,对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权衡与取舍,最终选定的结果就是一种均衡结果。当然,人们

的金融活动均衡结果不一定表现为最优或公平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者对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正式金融规则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深度分析的同时,给予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做出评估比较,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或政策建议。评估一个金融机制或制度安排时,主流经济金融理论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效率”——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二是看它是否激励相容^⑤。

(二)主流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在金融理论延伸

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五步说”自然会引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采用怎么样一种研究方法将它们有效合理的结合起来,对所研究的金融问题且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借鉴钱颖一和田国强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的归纳,并将它们在金融理论领域进行延伸^⑥,有以下三点具体内容:

1.研究平台。如果按照国内把金融理论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部分,那么,主流宏观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理论,主流微观金融理论的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博弈论等),它们是主流经济学和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研究平台或奠基石。另外,对金融业进行必要的规制在世界范围是一种共有的现象,近40年发展起来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些基本内容、方法和思路等为我们研究一些金融问题,特别是针对金融制度安排设计、各种金融制度和机制的比较和各种正式金融规制设立等提供了一个新的和更高层次的研究平台。

2.参照系(基准点)和度量标尺。参照系或基准点主要是指已有的经济和金融理论界比较认可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模型,它们往往是一些描述市场条件下(理想状态中)的标准经济学和金融模型,比如MM定理、资产定价CAPM理论为公司金融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系;再如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赫维兹(Hurwicz)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和拉丰(Laffont)的激励理论等,可以为对于转型时期的

中国某些特质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研究提供参照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参照系(标准经济学和金融模型)本身往往是建立在理想状态和条件下的逻辑结论,与现实中经济金融现象有一定差距,它们的重要作用和作用在于为人们理解现实提供参照或者度量标尺,它们一方面为研究者解释现实经济金融现象提供一定的价值判断基准,另一方面为研究者解释有关现象或者比较分析提供参照系。

3.分析工具。对于金融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定性分析,且尽量能够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使得理论更能够具有说服力,这需要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一些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拉丰和蒂若尔(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描述了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的替代关系,为分析组织共谋、政府规制以及集权与分权之利弊等问题提供了工具;再如戴蒙德(Diamond)和迪布维格(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为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提供了工具^⑦。

(三)金融活动参与者行为与主流经济理论强调的人类行为具有兼容性

社会学中的有关人类行为的各种假说,包括:“社会人”假说、“复杂人”假说、“文化人”假说、“组织人”假说、“理性人”假说和“经济人”假说等。主流经济学(主流金融理论)接受了“经济人”和“理性人”两假说,并作为其理论的基本假定和逻辑起点^{⑧[4]}。

“人是自利的”和“人是理性的”这两个人类行为基本假设或命题,在金融研究领域之所以重要有三:其一,一个理论如果没有一个理论前提被大多数人基本认可,大家就没法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交流、讨论或研究这一理论问题。其二,假定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自利行为有误,对于我们理论解释及其政策建议不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在金融理论里,如果我们采用了利他性假设,且在此基础上引导我们实践,那么,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负面后果要比前者要大得多,这在中国改革前有过案例^⑨。其三,特别在金融制

度或金融规则设计方面,如果把金融活动参与者的利己行为作为基本假设,并对金融活动参与者的一些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那么,金融运行和金融服务功能的结果往往得到人们预想的结果。这是因为,法治的前提和逻辑是承认人的不完善和私欲性,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对之进行一定的约束,其结果是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即使人的行为选择是受到自利之心驱动的,也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之事^[5]。

值得一提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中的关于人的理性假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表现为对经济理性的目标、约束条件、实现方式和适用范围的认识不断深化,叶航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1)主流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对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和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了补充;(2)在古典经济学中,收入是消费者唯一的约束,资本是生产者唯一的约束,而主流经济学从一个更深层次上揭示出“交易成本”和“信息”是除了收入和资本之外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3)西蒙(Simon)的“有限理性”假设和博弈论的发展,对经济理性行为的实现方式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发展^⑩。(4)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理论的创新,如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创立的家庭经济学和诺斯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等,已使得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向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和史学等领域渗透。

(四)主流经济学不足之处对金融理论的影响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不足,黄有光把它归纳为以下几点:(1)很多主流经济学理论过分地迷信简化模式,忽视了现实世界的一些有关因素;(2)主流经济学分析忽视了许多因素,例如,相互攀比、环保、不完全理性、制度、文化等。(3)过分的数理形式主义,即有些主流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变成数学游戏^⑪。另外,主流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问题,由此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且主流经济

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

对此,黄有光提出主流经济学应该吸纳非主流经济学派的成果(如制度、文化、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快乐研究等);采取折中主义(如要兼顾资源配置与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再如兼顾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分析);等等^⑫。钱颖一提出对于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要注重比市场和企业更为深层次问题的研究,那就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

很显然,源于主流经济学理论内容的主流金融理论往往也会存在上文所述的不足之处,理论工作者简单套用并对于解释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往往会显得不足或者很难有说服力。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思维模式、分析方法、基本原理和一些研究成果的同时,积极探讨一些针对中国金融问题进行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方法,对我们解释中国现象和研究中国转型经济金融问题进行必要的补充。

三、演化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

(一)生物学隐喻

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⑬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一是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与生物有机体和生物过程的共同之处,毕竟经济社会所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人类,这一信念是经济学研究与生物学思想密切联系成为可能。二是现代生物学可以为经济学提供丰富的思想和方法^[6]。三是生物系统的经济系统都包含缠结的结构和因果关系,包含连续的变化和多样性,生物科学和经济学被公认已有共同的复杂性问题。四是笛卡尔的哲学和牛顿的力学是支持人类与自然界其余部分之间有一种最终站不住的感性区分,而这一其余部分主要是生物。五是生物学隐喻可以弥补主流经济学中力学隐喻的不足^⑭。

(二)思维方式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性

演化经济理论与根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基本思维、最优化、知识、企业概念、时间感知和随

机因素等方面。

1.基本思维。主流经济学受原子论和机械力学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复杂的人还原到一个理想环境中进行同质性分析,且从非理性环境和异质性逐步扩展;演化经济理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思维模式的影响,把经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作为分析基础。从这角度上讲,演化经济理论模型能够真实地表现,这是对人与人关系研究的回归,更贴近实际和有一定的说服力。

2.最优化和均衡。以源于经典力学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对某一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是通过一定的条件和行为假设建立相应的模型,在一定条件约束下对模型进行最优求解,论证实现最优路径的同时分析经济系统的均衡特征。演化经济理论以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基因隐喻为基础,该理论所强调经济均衡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同时注重经济变化的动因分析,强调经济系统暂时性均衡的同时对到达均衡点的时间给予不确定性认定(很难确定多长时间能够到达均衡),在认同经济系统均衡点多重性的同时对于到达均衡的路径依赖持进化观。

3.知识。演化经济理论所述的知识主要体现为一种“默示知识”(即无意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具有不可测性和不可比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约束、个体计算能力的异质性和知识分布的差异性,使得人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并做出最优决策,更多体现为某些人获得成功后的其策略被其他人仿效,因此,微观经济主体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是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而经济系统里的很多一般性规则也是一个演化过程。当然,这些一般性规则也将成为一种共同知识并对后继者节约了很多创新成本。

3.企业与竞争。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企业价格竞争机制,企业竞争过程一方面使得市场状态变得有序和稳定,另一方面竞争能够使得企业向平均利润水平靠近。演化经济理论超越

价格竞争论,认为在现代市场和产业中,除了价格竞争机制外,企业的产品、技术或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引进成为首选,这些因素对于企业竞争参与者显得更为重要。另外,主流经济学一般假定企业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而演化经济学则假设企业有搜寻利润的行为^⑤。

4.时间和感知。主流经济学注重均衡状态的研究,把时间看成是对称的或可逆的过程,往往假设企业面对环境变化能够做出立即的反应,在瞬间完成调整的同时企业达到新的均衡。演化经济理论则注重达到均衡的过程的研究且强调过程与时间重要性,认为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也就是,演化经济理论往往假设企业决策或社会经济是一个不可逆的连续过程,企业决策是一种学习、模仿竞争对手和改进自身策略组合的过程,是一个适应性的“试错”过程,而且,企业的“模仿”和“试错”过程除了对于企业今天产生影响以外,今天行动策略和结果还将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时间在进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5.随机因素。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重要变量及其均值上,忽略不确定性因素与随机变量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且在理性人假定下,人们面对不确定因素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演化经济理论往往把随机因素看成关键性因素并对之进行分析,强调决策的搜寻和革新过程,认为随机变量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往往会对长期最优化决策的实现产生影响,造成经济系统长期趋势在其进化过程中难于预测。

(三)分析方法

相对于新古典研究方法来说,演化经济理论重大变革是其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

1.自组织理论方法^⑥。与达尔文生物学里的竞争适者生存和变异选择有一定的差异^⑦,该方法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根本力量在于系统内部的自组织力量^⑧,且这个自组织过程就是新事物和新秩序等创新过程。此外,该方法强调随机因素和不确定性在社会经济系统轨道中的重

要作用,即一个不确定性小事件发展也会改变这一个系统的原有发展路径。

2.演化博弈论^⑩。演化博弈论是演化思想和博弈论结合的产物,该理论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就是进化稳定策略。所谓进化稳定策略就是把经济分析均衡点看作是调整过程的产物,它分析策略主要体现为把博弈过程进行动态化,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均衡选择。进一步看,演化博弈论是纳什均衡理论在经济领域的有效补充,它以有限理性为基础,强调纳什均衡的进化机制和发展动因,从而使得纳什均衡理论更具有现实性的同时更好地解释了经济博弈的动态过程。

(四)有关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分析

在演化经济学理论中,把企业看成“对外”和“对内”两部分进行区分。所谓“对外”指的是企业在市场主体中充当追逐经济利润的组织机构角色,它是竞争市场中的一员;所谓“对内”指的是企业在其内部往往会有自己的一套做事方式,且企业行为往往由“惯例”为基础,这些“惯例”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基因”可以“继承”和传递,一旦形式具有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惰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且“传输”其重要特性。其中:在特定的企业组织结构和雇员行为习惯以及企业文化等往往成为信息、默示知识和技能的载体,它们共同作用并决定一个企业所采取的行动。

“技巧”(Skills)在演化经济学理论中是描述个人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谓“技巧”是指人必须耗费一定的时间且经过学习和训练或经验积累才能获得的能力,个人技巧似于组织的惯例。具体来说:首先,技巧涉及到的是一系列步骤问题,每一个连续的步骤都由前一步的完成引起且受前一步骤因素影响;其次,完成技巧的基础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默示知识。第三,运用一种技巧常要作许多“选择”,但人们的选择往往是在无意识进行的。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演化经济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个人技巧”和“组织惯例”,作为分析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之基础,体现了一种与主

流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思维,其惯例行为除了体现在企业中传输管理及工作技能之外,还对各种社会制度有广泛的影响,且这种惯例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在所有制度中充当“基因”。

四、研究中国金融问题过程中两者的结合点分析

如前所述,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比较统一的分析框架、比较严谨的逻辑推理分析和强调经济行为研究等优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它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非均衡、动态的和复杂的经济现象难于给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同时也不太注重历史因素对现实经济的影响。

演化经济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兴起的主要非主流经济学之一^⑪。在看问题的出发点上,它更加注重经济变化过程的研究(如:新偏好的形成、技术的创新过程、制度创新过程和新资源创造过程等),即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7]。因此,Foss把演化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归纳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特别是针对制度变迁和演化问题进行研究,演化经济理论已经达成一定的演化制度分析的基本共识,即以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变迁的演化观以及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为基本点,深入分析经济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互动作用机理。

目前,演化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互兼容的做法在经济学理论界有了一定的认同。例如:维诺曼(Vromen)认为,演化经济理论并没有完全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之处就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等正统理论中忽视的演化过程和机制进行加强甚至放置于理论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看成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特例。再如: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理论不断发展,正说明演化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走向综合之趋势。

针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的研究,演化

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上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抽象法、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是系统方法,以及归纳法和演绎法等分析方法相互兼容之体现,对于研究中国这一正处于转型过程的比较复杂的经济与金融现象是有较大的帮助的。

在金融环境界定方面,由于中国金融是以行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以及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因此,针对中国转型金融问题研究时,把演化经济理论中“遗传基因”(政府行为)惯例和经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本思维,以及金融制度设计的默示知识、各种决策是一个适应性的“试错”过程的时间与感知分析和随机因素关键性等内容,融入并刻画转型金融环境特征显得极其重要,包括:初始条件、金融产权、历史金融制度等因素特征。

在经济人行为假设方面,由于转型时期金融活动以规制和中央集权为主导特征,因此,对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包括政府金融规制部门、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等)作为经济人和利己与有限理性的假设,以及演化经济理论中有关受有限理性约束和知识分散化影响的个体异质性和知识分布差异性的假设或前提是极为必要。

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转型时期金融活动的法治建设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律规则体系不够完善使得金融规则的形成路径往往是由政府及其金融专业部门主导,这也说明了转型时期政府实施的金融规则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问题。因此,可以演化经济理论中动态过程、暂时均衡、均衡点的多重性和到达均衡的路径进化依赖等最优化和均衡分析,以及决策的适应性“试错”过程的时间和感知的观点,融入金融游戏规则制定的目标和过程的分析。

在分析人们权衡取舍方面(选择均衡结果),一旦给定金融环境和金融制度安排(游戏规则)之后,金融活动参与者的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出激励反应,演化经济学中有关企业

有搜寻利润的行为、“个人技巧”和“组织惯例”等分析,是对主流金融理论中有关金融活动参与者的权衡取舍以及均衡结果等有效补充。

在分析工具方面,对于转型时期一些金融问题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主流经济学一些经典数学模型以外,可以借鉴进化稳定策略的演化博弈论分析工具,对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金融问题分析更加贴近现实。这是因为,一方面演化博弈论是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演化思想和博弈论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转型时期很多金融活动均衡问题看作是金融制度调整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突然出现的東西。

五、研究中国金融问题应该注意的几点

(一)经济思想的重要性

虽然金融学概念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界定,但金融学是经济大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其基本原理均来自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是基本认同的,且众多的金融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交叉理论(法和金融、金融工程等),一般来自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其思维模式(理念)和研究方法^①。然而,一个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往往是前人经济思想的延续和升华,且经济思想一般经过“前期加工”(规范分析)到深入细致分析且抽象化之后,才能系统化为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再次的修正和发展,然后才用于解释现实问题或运用到其他领域的研究^②。

因此,当我们借鉴主流的经济理论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内容、方法和框架来研究中国金融问题时,首先要理解该理论的思想渊源,并按照主流经济惯用的思维模式对该理论进行归纳,评价理论的实用性和方法论特点,然后才运用到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来。

(二)历史重要性

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曾描述他的看法,即经济学研究需要以历史、统计和理论为基础,且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比较完整的经济分析,历史对于经济学家是不可缺少的知识内容。诺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与结构

变迁》的序言中深刻地揭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钱颖一在其《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中指出:“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政策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很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田国强在其《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论述到:对“经济环境刻画越精炼和深刻,论证就越来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而要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其首要任务就是要了解与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现实状况等与历史息息相关的因素。

进一步来说,运用演化经济理论中的一些思想、基本概念和方法来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金融问题的实质和特征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三)“经济学数理化”的说明

一般来说,“经济学数理化”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经济学研究过程和框架内容运用数学逻辑思维方式和数据分析作为支撑;第二层含义是经济理论的存在方式向数学靠拢;第三层含义是在经济学的论述和交流中,从使用文字语言转变为使用数学语言,这也是现代国外著作和论文常用的方式。

由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比成熟市场要复杂得多,若对成熟的市场理论只是做简单修改往往是不能用于解释中国现象的,因此,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要用数学,但要慎用。“经济学数量化”其最主要强调的是数学的思维方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学数理化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含义的运用,即经济观察和分析决定经济现象的因素及其关系的主张^③。

需要说明的是,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研究时,如果盲目或简单地模仿和套用现代西方模型,随意运用第三层含义的“经济学理化”

方式解释研究中国金融现象,其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翻译和介绍,解释中国现实乏力;二是只讲数学及其运算,忽略了最重要的数学背后的经济含义与经济现象的逻辑联系。

六、结论

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强调“两个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金融业具有什么特质?从转型时期政府行为特点出发,金融领域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金融下一步究竟改什么和怎么改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金融学术界、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同时关注的问题。

对于学术界而言,我们应准确地识别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人行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所谓一般性就是指中国的消费者、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一样,在各种资源、技术和制度等约束条件下,他们也是利己和受利益驱动的行为人;所谓特殊性是指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背景、发展路径和约束条件(金融生态)与他国不同,特别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对经济的影响较为突出,包括: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对金融的影响、金融规则与机制设计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其行为的特质性(异质性)金融中介行为等。这些一般性和特殊性因素,一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基本假定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我们分析金融问题时的约束条件综合。

按照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定义,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或者解释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那么金融理论主要是研究和解释人类金融行为和金融现象的学科分支。因此,在研究转型中国金融问题时,除了借鉴主流经济学的比较成熟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将之延伸到金融领域以外,更多地融入演化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概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基本结

论,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中国问题实质。同时,该理论注重经济的初始条件、创新动因、路径依赖等过程的研究,强调历史和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以及制度分析中的整体观、演化观、价值结构变迁、最小破坏原则和注重对权力的分析等。另外,演化经济理论强调的人们面对不确定环境时不断试错、摸索前行、不断学习的演化过程和重视“路径依赖”的作用,对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改革特点和金融现象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讲更加合理。

注释:

①田国强(2005)认为比较规范的主流经济学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

②这是因为,经济金融现象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地刻画,只能是主观性地判断和描述性地分析,“不同的主观判断,就会导致对经济环境的不同界定,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学派或理论结果”(田国强)。

③在给定现实金融环境和金融游戏规则下,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在进行金融活动时做出权衡取舍,但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的行为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对行为进行假定时需要进一步的类型细化和分类具体刻画。

④标准主流经济金融理论主要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安排,并对各种市场结构下的配置结果做出价值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公平等),一般假定市场制度安排是处生给定的;当研究一个具体金融组织的金融行为和选择时,应将金融制度安排假定为内生决定的,这样更接近于实现情况。

⑤所谓激励相容就是将自利的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统一起来,使得每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

⑥钱颖一和田国强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归纳为: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和分析工具等内容。

⑦这种工具的作用实际上是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金融行为和现象。

⑧实际上,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和柏

拉图等著名学者,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苏格拉底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和卡西尔则从“符号化”去追索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从“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中去探索人的本质,不能“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能从“抽象的一般的力量”去探索(尹世杰)。

⑨例如,我国早期宣传并强调和否认人自利的“一大二会”,在文革时期宣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使得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也缘;从一定程度上讲当时制度安排是基于人的利他无私之假设(田国强)

⑩有限理性假设并不是对理性假设作完全否定,只是说明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田国强)。此外,古典经济学对理性描述主要基于人与物之间,博弈论描述的是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选择人选择的函数。

⑪实际上,很多的基本微观、宏观经济学知识和原理是分析和讨论现实经济学问题,或作为经济政策建议的最重要的工具,比起高深数理理论重要得多(黄有光)。

⑫同时提出中国经济学问题研究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守法程度的差异,党政主导经济的程度等中国转型期的一些特点,分析国有企业和与之有关的金融问题、城乡差异等。

⑬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概念提出开创了经济学的生物学隐喻,之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阿尔契安(A.A.Alchian) 彭罗斯(E.T.Penroso)、赫什里弗(J.Hirshleifer)、塔洛克、纳尔逊和温特等)相继地运用生物学隐喻对经济理论进行研究。

⑭由于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基于力学分析,力学隐喻拒绝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知识、数量变化和不可逆特性,使经济学研究陷入没有系统误差、没有累积发展的均衡模式之中。

⑮在稳定环境条件下,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搜寻利润行为区别不大,当环境不稳定时,企业很难保证取得最优解,而随机事件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搜寻利润行为差异较大。

⑯自组织理论首先是在非平衡热力学中由普利高津等发展起来,并逐步渗透到生物学以及社会经济研究的许多领域,为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方法。

⑰达尔文将适应现象的产生完全归之于一种外在的原因,即环境对不适者的淘汰,而没有考虑到有机体的主

动适应机制。

⑮整个生物系统和人类活动的经济系统很显然都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而且任何一个开放的系统都有自身趋于日益复杂的结构和秩序的能力。

⑯演化博弈论是演化思想和博弈论结合的产物。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发展起源于传统博弈论所遭遇的困难:传统博弈论分析和讨论仍是基于纳什均衡的“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识”之假定,这种假定虽然能够保证在持有对其他博弈参与人如何行动的信念的条件下,每位博弈参与人能做出最佳反应,但无法保证这种信念的正确性;特别是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这必然要导致纳什均衡的不可行。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博弈论研究的重点已转向了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演化博弈论。

⑰按照贾根良的归纳,目前被引入演化经济学的学派包括: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法国的调节学派等。本文认为,这些非主流学派至少是接受演化经济理论中心有关思想和研究方法的。

⑱如:在金融学里的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经典之作——MM定理,其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均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环境假定和推理(甚至可以追索到经典力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再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现代主流经济中的合同理论和激励理论,在3-5年之后,金融经济学家才把非常抽象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角色搬到金融学领域。

⑲张五常(Steven Cheung)的佃农制理论(原创思想)经斯蒂格利茨(1974)年的数学精确地分析之后使得激励理论与契约理论迅速地在其他领域发展;法马(Eugene Fama)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后来经霍尔斯特罗姆(Holmstrom)等人用模型精确地分析之后,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中的热门研究课题(钱颖一)。

⑳更何况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未建立起“中国市场特色的”包括宏观、微观及其基本定量分析的理论体系框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也只是刚刚起步阶段。更何况是“基本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东西,是分析、讨论现实经济问题与作经济政策建议最重要的工具,比高深数量理论重要得多”(黄有光)。

[参考文献]

[1]黄有光.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J].比较,

2003,(第十一辑).

[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3]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4]尹世杰.再论当代经济学应加强对人的研究[J].经济动态,2004,(7).

[5]杨春学.经济人与制度建设[J].经济研究,2002,(4).

[6]王翼龙.从经济学的力学隐喻到经济学的生物学隐喻[J].经济动态,2000,(12).

[7]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8]贾根良.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3).

[9]冯杰.回归古典与接近自然的经济进化理论[J].经济科学,2000,(5).

[10]蒋德鹏,盛绍瀚.演化经济学动态与综述[J].经济动态,2000,(7).

[11]蔡跃洲.技术经济研究方法及方法论述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0).

[12]叶航.经济理性与经济学的成功[J].经济学家,2001,(5).

[13]黄维芳.实验经济研究方法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24).

[14]严维石.经济研究方法演变[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3).

[15]蒋南平.经济研究方法之辨[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10).

[16]Hodgson G.1993,“Economic and Evolution: bring life back to economics”,Cambridge:Polity Press.

[17]Metcalf, J.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9.

[18]Nelson, R.R. and Winter, S.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N.J.Foss, Real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Systems, 1994.

【责任编辑:彭 勃】